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马克思：反 思

列 宁：纪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简介

列宁生前出版的《列宁全集》

杜林其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史略

有关《反杜林论》写作和发表的若干背景史料

一个新的“共产党人”(倍倍尔)

马列著作译文有哪些新的改动？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一卷问世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第一辑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译局资料室编
列 宁 斯大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6印张 135,000字
1978年12月第1版 197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7001·47 定价 0.58元

(内部发行)



编 者 的 话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是不定期的内部读物，目的是为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工作、教学工作和编译出版工作的同志提供参考资料。

本资料登载国外新发表的马列著作，有关马列著作的研究资料，有关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传记材料以及他们提到或批判过的著作、人物和流派等方面的材料，此外还介绍马列著作的翻译和出版情况。

读者对本资料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希望随时告诉我们，以便不断改进。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资料室
列 宁 斯大林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

第一辑 目 录

反 思 马克思 (1)

纪念雅·米·斯维尔德洛夫 列 宁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至五十

卷(补卷)简介 袁延恒 (23)

列宁生前出版的《列宁全集》

——介绍《列宁全集》俄文第一版 丁世俊 陈立敬 (39)

附表 《列宁全集》俄文第一版基本情况一览

杜林其人 梁建华 (55)

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杜林主义的斗争史略

.....〔苏联〕A·B·切尔诺夫 (72)

有关《反杜林论》写作和发表的若干背景史料 (109)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关于杜林的通信 (111)

威·李卜克内西致弗·恩格斯(1874—1877年,
二十封) (111)

威·白拉克致弗·恩格斯(1876—1877年,四封) (126)

约·狄慈根致威·布洛斯([1874年],一封) (129)

伊·奥艾尔致威·李卜克内西(1877年7月31日, 一封)	(129)
约·莫斯特致威·李卜克内西(1876年7月20日, 一封)	(130)
爱·伯恩斯坦致威·李卜克内西(1874年11月26 日,一封)	(131)
杜林运动和摩尔人俱乐部	伯恩斯坦 (139)
一个新的“共产党人”	倍倍尔 (143)
1877年5月29日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 表大会关于在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辩论情况(《大会记录》 摘要)	(150)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选举委员会反对欧 根·杜林的声明(1877年11月17日)	(155)
马列著作译文有哪些新的改动?	(157)
《哥达纲领批判》译文修改情况	(157)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译文修改情况	(162)
皇权主义和俄国的三次农民起义 ——对斯大林一段话的说明	卞继竹 (171)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料选编》(丛书) 编译 情况	李宗禹 (176)
《研究〈哥达纲领批判〉参考史料》一书简介	胡文建 (180)
《马克思恩格斯年鉴》第一卷问世	蒋仁祥 (183)

反 思

马 克 思

一方面是实业家¹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前者是资本的转移，后者是收入和资本的交换；前者靠他们自己的货币来实现，后者靠他们自己的铸币来实现；——亚·斯密所作的这种区分是重要的，并且无论是图克，还是早在金条委员会的报告中，都提到了这一点。²但是，唯一缺乏的，是这两种贸易、两种货币之间的联系。

(1)所有的危机事实上都表明，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总是超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为它所设定的界限。经济学家们证明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至少是不可能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一切论断，正象西斯蒙第反驳麦克库洛赫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只涉及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³如果考虑到下面的事实，这一点就更为明显了：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工人和零售商以及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但这种交换又取决于工人和工业资本家之间的交换，而后一交换又受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换所制约，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2)当然，正象亚·斯密所说，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换必然受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的限制，因为向消费者出售的价格是最终价格，这种价格反过来必须在利润之外再补偿先前交易中的生产费用。不过，在亚·斯密上述原理的基础上，整个经济学

被蒲鲁东粗暴地简单化了，⁴等等。事情并不如此简单。首先，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例如在英国，决不[仅]受英国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而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还受全世界市场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例如，[东]印度公司⁵或东印度商人把蓝靛运到伦敦市场上，在这里拍卖蓝靛。这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易。蓝靛的购买者把一部分蓝靛卖给法国，卖给德国等等，在这些地方它们被该地的商人和工厂主买去。他们最终是否能赚回蓝靛的价格，则取决于最终的产品向消费者销售的情况，这些消费者也许住在伊奥尼亚群岛上，或住在阿富汗斯坦，或住在阿得雷德^①。因此，说许多国家内的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受一个国家内的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是错误的。如果这种[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是世界性的，那就受世界市场上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的限制，而且，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本身规模越大，这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占的地位越重要，就越是如此。其次，因为工人阶级构成消费者的最大部分，所以可以说，随着工人阶级收入的减少，——不是象蒲鲁东所认为的在一国中的减少，而是在世界市场上的减少，——就会造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相适应，从而造成生产过剩。这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有产阶级日益奢侈，这种情况有所改变。把这种论断绝对化，说什么种植园主的贸易取决于他的黑人的消费，也同样是错误的。第三，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大部分造成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例如，如果工厂主从投机商那里得到非常大宗的订货，那么工人就大量就业，工人的工资就增加，工人的消费就增加；在修筑铁路的投机中，造成了非常大的最终消费，

① 澳大利亚南部的城市。——译者注

可是最后表明，这纯粹是“非生产的”。事实上我们也发现，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大多在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面前最终碰壁。危机总是最先发生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自然，往往发生在有限的消费能力已经得到满足之后，不过往往只是发生在供给超过了对[需求]的所谓估价的场合（例如粮食投机时）。**第四**，生产过剩不只归因于生产的不合比例，而且也归因于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

（3）至于出现在两种不同的贸易形式中的**货币**，即在真正贸易中的流通手段和在收入同商品即一部分资本相交换中的流通手段，那么，只确认它们之间的分离是不够的，问题在于它们的联系和相互作用。私人的货币，消费者的货币，第一是所有政治和意识形态阶层的货币，第二是地租获得者的货币，第三是所谓资本家（非工业资本家）、国债债权人等等的货币，还有工人的货币（在储蓄银行中），简言之，也就是居民中不从事贸易的各阶级的收入超过他们的日常开支，以及超过他们认为必须始终由自己支配，也就是作为个人储备来保存（贮藏）的那部分货币以上的**余额**，这种余额是**存款**的主要来源，而存款又成为**商业货币**的主要基础。[资本]转移，信贷业务，总之，这个贸易界内部的整个货币运动，是建立在大部分不从事贸易的居民的存款基础上的。当[……]①信用缺乏时，这些存款就从贸易中抽走。资本成为非生产的，因为生产领导者阶级手中所掌握的支配资本的手段被消灭了。另一方面，当这些阶级需要货币来在他们本身之间进行交易，而银行不再借货币给商店老板和工厂主的时候，消费者自己手中的流通手段也随收入的减少而减少了，这样，缺乏货币的怨言就从贸易界进到消

① 这个词没有辨认出来。——原编者注

费界。

(4) 说在危机时全部问题在于缺乏信用而流通手段是无所谓的,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根据上述原因很清楚, 在这种时候, 流通手段的量是最多的^①, 这是因为, 一方面, 流通速度减慢了, 第二, 因为大量的交易需要现金, 而以前却不需要。正因为如此, 在货币量和只用较少量的流通手段就能完成的那种交易的价值之间, 也就出现巨大的差距。可见, 事实上缺乏的是流通手段, 而不是资本。资本会贬值, 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而在这里, 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不能转化成流通手段, 而资本的价值正在于可交换性。但是, 尽管如此, 资本是现实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票据不能贴现, 甚至建立在诚实交易上的那些票据也是如此。而票据是商业货币, [它的]价值代表商业资本。银行券兑换黄金的能力降到了最低程度, 银行券贬值只会加重商业危机。现实的困难是商品即现实资本不能换成黄金和银行券, 由于这个原因, 也就发生了 1793 年、1825 年和 1847 年的现象⁶, 那时, 凡是有现实资本的地方, 都可以求助于发行国库券和银行券的办法。不能断言这些国库券和银行券就是资本。它们只是流通手段。危机没有停止, 但货币危机停止了。因此, 银行券兑现的幕后是有价证券的兑现, 不仅在银行业中是如此, 而且在贸易中也是如此。甚至那些按性质来说可以兑现的有价证券, 如国家有价证券, 短期票据, 也都停止兑现。显然, 问题完全不在于商品, 而在于代表商品的价值符号的兑现。商品不再是货币, 它们不能再换成货币。显然, 这种缺乏被归咎于货币制度, 归咎于货币制度的某种特殊形式。这是以货币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 同样, 货币制度又以现有生

^① 俄文版译为“最少的”, 并加注说这是马克思的笔误。——译者注

产方式为基础。银行券兑换黄金归根到底是必需的，因为商品必须兑换成货币；也就是说，因为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必须有不同于商品的**特殊存在**；也就是说，因为总的说来存在着私人交换制度。货币贬值和商品贬值事实上甚至成反比。但是，银行券所以能够在对黄金的关系上贬值，只是因为商品能够在对银行券的关系上贬值。总的说来，银行券贬值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商品即商品的价值必须在任何时候都能转化成金银，商品和黄金之间的每一中间环节或代表，终归只是代表，因而没有价值。可见，主要问题始终是**商品即资本本身不能兑现**。某些人说，缺乏的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流通手段是无关紧要的，这种说法是荒谬的。因为在这里，问题恰好在于资本即商品同货币之间的区别；问题在于，前者不是必然地把后者作为自己的代表，作为自己的**价格**带到贸易界来，资本不再是货币，不再能流通，不再是价值。而可笑的是，当资本表现为次要东西的时候，却把货币说成次要的东西。另一方面，另一种看法就更荒谬了。人们重视资本的不能兑现，却忽视了银行券的可兑现性，但是，他们想通过某种人为的措施和改变**货币制度**的办法来消除资本不能兑现的状况，仿佛资本的不能兑现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任何货币制度的存在中，甚至仿佛并不是已经包含在产品作为资本形式的存在中。想在这一基础上改变这种状况，那就取消了货币所以是货币的属性，而又使资本不具有始终可以交换，而且是按照公正价格交换的属性。在**货币制度的存在中**不仅包含着[商品与货币]分离的可能性，而且已经存在着这种分离的现实性，并且这种情况证明，正是由于资本同货币相一致，资本不能实现其价值这一状况已经随着资本的存在，因而随着整个生产组织的存在而存在了。但是，说什么对货币市场的这种压力只是由信用欺诈引起的，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货币本身又造成

了信用制度。换句话说，同一个原因产生了这两者。北明翰派⁷当然是些蠢人，他们想靠发行大量货币，或使货币的标准贬值，来消除货币的不便之处。蒲鲁东、格雷等人也是些蠢人，他们想保留货币，但又不让货币具有货币的属性。因为货币市场上发生了普遍危机，而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面恢复表现为一些征兆，这些征兆不用说会突然重新成为[普遍危机]的原因，所以，再简单不过的事情，莫过于那些目光短浅的、坚持资产阶级基础的改良家们希望改革货币了。他们保留产品同产品的可交换性之间的分离，因为他们保留价值和私人交换。但是他们想好好地安排这种分离的符号，好让这种符号表示同一。

(5)十足的头脑简单的人，即老实的不学无术的民主派，只知道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中的货币。因此，那个爆发冲突的领域、风暴、货币危机和大宗货币交易，是他们所不知道的。因此，问题对这些头脑简单者来说，也象一切事物对他们来说一样，是如此的简单和幼稚，就象他们自己一样。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他们所看到的是价值和价值的老老实实的交换，在这种交换中，个人的自由得到了最高的实际的确认。在这种交换中谈不上阶级对立。一个商人同另一个商人相对立，一个有货币的人同另一个有货币的人相对立。每个人必须拥有货币，才能进入消费贸易，也就是才有可能生活。这个事实显然是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本身是由如下的事实造成的：每个人必须劳动，象施蒂纳所说的⁸，使自己的能力显示出来。首先，在所有至今的、建立在种姓、部落、阶层、阶级等等的差别和对立之上的社会制度中，货币都是这种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货币制度则是这种组织历次衰兴的[表现]，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可见，我们无须证明，货币制度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之上的，倒是那些头脑简单的人们必须

证明，不管以前的所有历史经验如何，货币制度甚至在没有阶级对立的情况下也有某种意义，以前所有社会制度的这一环节，在否定以前所有社会制度的那种[社会]状态下也能继续存在。但是，在十足的头脑简单的人们面前提出这种任务是非常幼稚的。因为他们是靠单纯的措辞造句来解决一切问题的。这正是他们特别伟大之处。在他们看来，货币制度，以及全部现存制度，是如此善良，如此笨拙，正象他们自己一样。

但是，我们还是回来谈他们所喜爱的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吧。除了这种贸易之外，他们在前后左右是什么也看不见的。

自由的个人用什么东西来从店铺老板手里购买呢？用自己收入的等价物或价值符号。工人用工资、工厂主用利润、资本家用利息、土地所有者用地租——它们转化成金银和银行券——从店铺老板、鞋匠、肉店掌柜、面包房老板那里交换[商品]。而鞋匠、店铺老板等等用什么来交换转化成货币的工资、地租、利润、利息呢？用自己的资本。他们在这种行为中补偿、再生产和扩大资本。

可见，在这种看来如此简单的行为中，**第一**，表现出总和的阶级关系，表明事先存在着雇佣工人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工业和非工业资本家阶级。另一方面，首先表明事先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使财富具有资本的性质，并使资本和收入分开。由于[收入]转化为货币，简单性也就消失了。

而且，工人获得用货币支付的工资，同样，土地所有者获得用货币交纳的地租，工厂主获得货币形式的利润，而不是获得实物报酬、实物租和进行物物交换，——这种情况不过表明，货币制度和缺乏货币制度时比较起来，和货币以前的社会发展阶段比较起来，其前提是更高的发展阶段和更大的阶级划分和分离。没有货币，就没有雇佣劳动，因而也就没有利润和处于另一种[社会]形式上

的利息，因而也就没有地租——它不过是利润的一部分。

在货币的形式上，在金银或银行券的形式上，收入当然已经不能让人看出，它所归属的个人，只是作为属于某一阶级的个人，只是作为阶级的个人，只要个人不是靠行乞或偷窃获得这种收入，因而，只要不是从这种形式的收入中侵吞一笔收入并以相当强制的方式成为某一阶级个人的代表。〔收入〕转化为金银，抹杀和掩盖了阶级性质。由此造成了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面上的平等——撇开货币不谈。另一方面，在货币制度充分发达的社会中，由此事实上造成了个人的实际的资产阶级平等——就他们拥有货币，而不管这种收入的来源而言。这里已经不是象古代社会那样，只有特权人物才能交换这个或那个，而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一切，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收入转化成的货币的数量来进行任何的物质变换。娼妓、科学、庇护权、勋章、地租、阿谀者，一切都完全象咖啡、糖、鲑鱼一样成为交换物。在等级的范围内，个人的享受，个人的物质变换，取决于个人所从属的一定的分工。在阶级的范围内，则只取决于个人所能占有的一般交换手段。在前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受社会限制的主体，进入由他的社会地位所限制的交换。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作为一般交换手段的所有者，进入同社会为万物的这一代表者所能提供的一切东西的交换。在货币同商品的交换中，在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这种贸易中，当工厂主从店铺老板那里购买时，他象他的工人一样是消费者，仆人和主人都是用同一货币价值得到同一商品。因此，在这种交换行为中，转化成货币的收入的特性消失了，一切阶级的个人都变得模糊而消失在买者的范畴中，他们在这里同卖者相对立。这就产生了一种假象，即在这种买卖的行为中看到的不是阶级的个人，而是没有阶级性的单纯进行购买的个人。

我们首先撇开收入的特有性质，这种特有性质不表现在金银上，就象尿味不表现在妓院税上一样，罗马皇帝阿德里安曾说这类税没有臭味⁹！这种性质重新表现在〔收入所有者〕所支配的货币量上。整个说来，购买的范围取决于收入本身的性质。最大的消费者阶级即工人所购买的物品的范围和品种，受他们的收入的性质的限制。当然，工人可以不为自己的子女买肉和面包，而把工资买白酒喝掉，这是在实物工资制下做不到的。这样一来，他的个人自由就扩大了，也就是说，白酒的支配作用有了更大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用他们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积蓄可以不去买肉和面包，而是去买书籍以及请人讲演和召开群众大会。工人阶级有了更大的手段来占有象精神力量这样的普遍社会力量。凡是收入的性质仍然取决于谋得收入本身的性质，不是象现在这样单纯取决于一般交换手段的量，而是取决于谋得收入本身的质的地方，工人能够与社会发生的并且能够掌握的那种联系，是无比狭窄的，而进行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物质变换的社会组织，从一开始就受到一定方式和特殊内容的限制。因此，货币作为阶级对立的最高表现，同时使宗教的、等级的、知识的和个人的差别变得模糊。封建主曾徒劳地试图——例如在对资产者的关系上，采取奢侈法的办法——在政治上防止和摧毁货币的这种起普遍拉平作用的力量。可见，在消费者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行为中，质的阶级差别消失在量的差别中，消失在购买者拥有的货币的多少中，而在同一阶级内部，量的差别则形成质的差别。于是，〔区分为〕大资产者、中等资产者、小资产者。

（张钟朴、王锡君译）

译者附记

这里发表的马克思的手稿《反思》，大约写于1851年3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是马克思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时期。1848年革命后，马克思被迫移居伦敦，他利用英国博物馆拥有丰富图书资料的方便条件，开始系统地研究英、法、意等国著名经济学家的著作，特别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马克思一边研读原著，一边作摘记。从1850年9月到1853年8月，共写了二十四个笔记本，标以罗马数字I至XXIV，其中主要是政治经济学问题的摘录。

《反思》这一手稿包含在第七本笔记的第48—52页中，这个笔记本是马克思在1851年2月底或3月初开始写的，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当月写下的。大约在1851年3月底或4月初，马克思又同时写第八本笔记，然而在4月份，马克思从事的经济学摘录工作中断了将近一个月，在1851年5月份才写完了第七本和第八本。由此可见，《反思》这一手稿很可能是在1851年3月写成的。这一手稿是同马克思的一个短暂的想法紧密联系着的，当时马克思认为他已经完成了经济学研读的主要部分，并且能够从作摘录转入独立地弄清一些疑难问题（参看马克思1851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

这个手稿的前几页上，有从托·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1844年伦敦版）一书中作的简短摘录，该书第七章就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流通同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的区别”。图克的这一思想以及亚当·斯密的与此有关的思想，虽然促使马克思酝酿了《反思》的写作，但马克思在摘录图克的著作时已经指

出，图克并不是提出这一问题的第一个人，而且马克思在自己的《反思》中对问题的提法，也远远超过了图克和斯密。

在写这一手稿的时期，马克思十分关心通货原理的代表和银行理论的代表之间所展开的论战，他在1850—1851年期间所作的大量摘录就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从这里得到了很多启发来写自己的货币理论。

通货原理所依据的是由大卫·休谟开始奠基并由大卫·李嘉图完成的货币数量论，按照这一理论，价格不仅取决于商品的价值，而且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因为这一理论没有把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流通和信用货币的流通区分开来，也就是让银行信用取决于金价格，所以在实践中多次造成如下局面：恰恰在危机开始的时候，即最需要货币和信用的时候，英格兰银行却造成人为的信用紧缩。这当然使危机尖锐起来。通货原理从1844—1857年曾贯彻在皮尔的银行法中，成为英国货币和信用政策的基础，结果遭到了失败。

马克思很重视象约翰·富拉顿和托马斯·图克这些银行理论的代表人物的著作，他们把流通的货币（银行券）同信用货币正确地区分开来，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又错误地把货币和资本等同起来。

马克思在下列著作中重新谈到了这一手稿中所讨论的问题：《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四章第十节（收入和资本的交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233—258页），《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章第十二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527—540页），在这些地方马克思又引用了斯密和图克的话。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三十章中以1847年危机为例，详细谈了借贷资本的量和利息率同危机周期之间的关系，在那里马克思还追溯了

1847年铁路投机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39—559页)。

关于本文的标题,要说明的是,“反思”一词是一个哲学术语,它在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中大致有两种含义:一为反映;一为后思,即事后思考。本文标题应为后一种意思。

马克思的手稿《反思》德文原文最初发表在东德《统一》杂志1977年第五期,俄译文最初发表在苏联《共产党人》杂志1977年第一期。这里的中译文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EGA)第一部分第十卷德文原文,并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四十四卷俄译文翻译的,正文中方括号[]中的文字是俄文版编者加的。注释主要采自国际版。

注 释

- 1 “实业家”这一概念,是马克思从亚当·斯密那里引用来的。斯密著作的法文版出版者加尔涅解释说,实业家“是指全体商人、制造业者、手工业者等等,一句话,是指一国工商业的全体当事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11页)。
- 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马克思1844年春天在巴黎摘录的是这一著作的法文版。1851年3—4月,马克思在写完《反思》以后紧接着又摘录斯密的主要著作,而且是根据1835—1839年伦敦出版的英文版(1—4卷)。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话,摘自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下卷第二章。

托马斯·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关系;纸币发行同银行业务分离的合理性》1844年伦敦第2版第34—36页。

金条委员会是1810年成立的,目的是研究英格兰银行有关金条和银行券之间的关系的政策。马克思在第七本笔记中摘录了有关这一委员会活动的报告(《调查金条价格高昂原因的特别委员会报告和说明。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1810年6月刊印,1810年伦敦版),以及由于公布这一报告而引起的辩论的一部分(查理·博赞克特:《关于金条委员会